

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

□ 刘新利

【摘要】现代性和全球化导致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危机，而大众传媒是现代化的催化剂，所以，大众传媒使少数民族传统被解构、断裂和碎片化，是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的诱因之一。但是，大众传媒也可以修补、重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并且对于少数民族产生积极的传统文化认同也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大众传媒；传统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问题是近几年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更是民族学、心理学、人类学、哲学学者研究的重点。而新闻学与传播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如凤毛麟角。事实上大众传媒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大众传媒传播的异文化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影响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同时大众传媒又可以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进而能够加深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总之，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文化认同的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不能缺位。

一、相关概念界定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①

传统文化就是指在历史上形成、发展并传承下来的比较稳定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聚拢着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既是一个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也是一个民族创造历史的基础。”^②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指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发展并传承下来的比较稳定

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并积淀的文明成果，是一个民族生存、繁衍、发展和繁荣的“内核”，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特征，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凝聚着这个民族的智慧、情感、意志和追求，如果一个民族的传统消失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离消亡不远了。

二、大众传媒是导致少数民族产生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的诱因之一

一般地说，现代性是对人的个性的肯定，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现代性导致了人的主体性的回归。按照弗洛伊德的定义，认同是个人与他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也就是说认同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而且这种心理活动存在的前提是个人要对自己身份有自觉意识。从这个意义说，现代性问题和人的认同问题也就有了某种必然的联系。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现代性肯定了人的主体性，激活了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的自我意识必须知道自己是谁，这就产生了认同问题，当然，现代性只是认同问题出现的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差异的出现，而全球化使人们有机会和能力广泛地接触差异文化，感受差异文化。“全球化进程就是一方面消解民族差异，另一方面又激发了民族文化特性的自觉。在这个

意义上，全球交往与其说锉平了文化差异，不如说使这些差异更加凸显出来，现代性不承认特殊性，因而使许多民族文化出现了认同危机。”^③

传统和现代是相对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现代性是反传统的，所以，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负面的。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和现代性的发展正强烈地冲击着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断裂，由于对现代性的过度认同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被解构，最终呈现出碎片化，从而使少数民族产生传统文化认同危机。

而大众传媒因为是现代化的催化剂，所以它也就自然地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被解构、断裂、碎片化的重要诱因之中，同时也成为导致少数民族产生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众传媒是现代化的催化剂，它本身是一种大众传播方式，是均质化传播，是拒绝特殊性的。但是，大众传媒传播的异质文化使少数民族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他们一方面接受了由大众传媒传播的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方面又不愿意看着本民族的传统消失，所以也会产生认同危机。

现代性、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少数民族的文化发生了变迁，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出现被解构、断裂和碎片化，少数民族出现了认同危机，这些结论大多是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得出的。

笔者丝毫不怀疑这些结论的可信性，但是现代性果真如有的学者说的是反传统的吗？现代性和大众传媒对传统文化难道只有破坏吗？随着全球化进程、现代性的到来以及大众传媒的普及，少数民族确实产生了认同危机，那么，这种认同危机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保护一定是有害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三、大众传媒也可以促使少数民族对其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认同

因为认同危机使少数民族认识到本民族传统文化所处的危险境地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前途担忧，这种文化的焦虑使他们产生了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然而，逝去的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由于文化变迁的不可逆性，所以，那些处于文化认同危机中的人们，又会自觉地对断裂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小心翼翼的“修补”或“重构”，这种行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是很有意义的。

李元元认为：“我们之所以要在现代化汹涌而至的今天保护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传统文化代表着民族的根本和归属。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也就是对民族身份的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构的不是事件本身，重构的是对‘我是谁’的认同情感。”^④

文化变迁实际上就是由碎片化到重构的过程。所谓的“碎片化”就是在社会变迁中，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替代，原有的文化在新的文化冲击下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母体，变成了碎片，许多旧的文化形态被打碎了，新的文化形态还没有成型，这就是“碎片化”。

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认同危机在移民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这些移民大多是因为响应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从比较偏远的地方迁入城镇。他们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是如何被解构而呈碎片化的。比如鄂伦春人和鄂温克人是两个生活在东北林区的以狩猎为生的民族，为了响应国家的环境保护政策从东北大兴安岭林区迁往城镇生活，随

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原有的民族文化不断碎片化，这两个民族的人面对传统文化的逝去和对新的文化的难以适应表现出了迷惘和焦虑。有的人大量酗酒，《神鹿啊，神鹿》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因为酗酒而导致死亡。据统计，这两个民族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面对这种状况，政府、学者和民族精英共同努力，帮助当地人唤回狩猎文化的记忆，并把这些记忆用书籍、影像资料记录下来，并借助大众媒介进行广泛传播。这样对这些告别传统狩猎文化的人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两个民族，了解他们曾经拥有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构过程。

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快速发展，极易使传统文化“碎片化”，但现代社会的高科技也使其具备了把“碎片化”的文化进行重构的能力。

李元元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过程分析——以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牧民定居点为例》，通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给我们展现了蒙古族牧民的传统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是如何“碎片化”的，又是如何在政府权力和民族精英的合力下被重构的过程。

在李元元的文章中，提到了当地政府和精英人物在传统文化重构中的作用。笔者要强调的是大众传媒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冲击和被解构的重要因素。那么，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是“修复”或“修补”，大众传媒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接触最多的大众媒介就是电视。电视的出现打破了少数民族社区封闭的状态，给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带来了大量外部世界的信息，使他们有机会接触不同于本土文化的异质文化。

许多人类学研究者做了大量的民族志研究，证明电视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重构了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同时打破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关联，对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传统艺术、价值观念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许多少数民族除了民族节日的特定

场合已不再穿民族服装，传统建筑和传统艺术正在消失，许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已不会讲本民族语言，对流行音乐的追逐使许多年轻人已不会本民族歌舞，许多年轻人不信仰本民族宗教，不认同本民族的价值观。

当然，导致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大众传媒却是不可小视的因素。总的来说，大众传媒带来的异质文化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碎片化，解构了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学界在研究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者得出的大体一致的结论。

有什么样的研究视角就有什么样的研究结论。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难道只有破坏吗？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难道只有负面作用吗？

张瑞倩在《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就是“文化修补”。她认为：“文化修补是指大众媒介对因社会变迁而断裂、缺失的传统文化的弥补，这也是传统社会的受众通过大众媒介空间对断裂的传统文化进行再发现的过程。”^⑤

搬迁至格尔木后，长江源村生态移民绝大多数有了电视，可以收到五十多个频道，电视加快了移民的现代化进程，也解构了他们的传统文化，并使其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但是，这些移民在现代化的洪流中并没有迷失自我，产生了文化自觉的人们也利用电视对已经断裂的，碎片化的传统文化进行“修补”，通过记录和重现使得传统文化得以保护。

张瑞倩提出的“文化修补”理论，以及她的民族志研究确实为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但有解构功能，同时也有修复、修补、重构甚至建构功能。当然，修复、修补、重构、建构之后的文化还是原来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吗？经过修补、重构后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否能为其成员所认同？将是我们进一步要探讨的问题。

张瑞倩做民族志研究的长江源村的居民从唐古拉镇迁往离格尔木市中心12公里的郊区，他们经历的民族文化变迁

和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定居点有着相似的经历,即都经历了在保留传统文化和接受现代化之间做出选择的阵痛,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文化自觉,进而对断裂的传统文化进行“修补”或“重构”,不同的是蒙古族人借助了民族精英和政府的力量,而长江源村的藏族居民则主要是利用了电视。

差异产生认同,长江源村在移民之后,在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频繁交往中,他们的民族认同意识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维护是民族认同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传统文化已被消解,正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电视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帮助人们唤回即将逝去的记忆。另外,电视对传统文化的再现,唤醒了人们的文化自觉,激发了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对少数民族产生积极的传统文化认同也是有益的。

当然,张瑞倩的研究只是个案,她的“文化修补”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能否用来解释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大众传媒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这还需要做更多的民族志研究。

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笔者认为经历了从消极的认同到积极的认同过程。

首先是全球化、现代性及大众传媒的普及使少数民族接受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开始视现代文化为先进,而视本民族传统文化为落后,

从而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消极的认同。但是随着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主要依靠学校和大众传媒,随着知识的增加,少数民族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现代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再加上媒体呈现的本民族传统文化消亡的报道和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开始觉醒,对传统文化表现出积极的认同。这种积极的认同促使他们投入到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去。

2004年,浙江电视台《亚妮专访》的一期节目,讲述了一位叫王安江的苗族老农为收集苗族古歌资料四处奔走求救的感人故事。在现代文化的不断渗透和影响之下,有着悠久历史的苗族古歌正面临严峻的断层和消失的危险,但仅凭一人之力却难以复兴。浙江电视台《亚妮专访》栏目深入苗乡,对苗族古歌的全面报道和全力支持,让人们看到了正在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升腾而起的希望。

杨丽萍编制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像》将云南彝、藏、佤、哈尼等10多个民族的民族歌舞、服装、乐器、民俗等民族文化形态搬上了现代艺术舞台。在舞台上,粗犷奔放的肢体动作、绚丽唯美的画面、空灵的音乐、略带野性的山歌把人们渴望心灵的回归,灵魂的升腾演绎得淋漓尽致。《云南映像》虽然是通过舞台来演绎,但是,它的广泛传播以至于家喻户晓,却是通过大众传媒来完成的。所以,可以说《云南映

像》是民族文化和现代传媒结合的成功之作,也是增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的成功之作。

小结

大众传媒传播大量的异质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断裂、被解构和碎片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地位受到威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由此产生。但是,大众传媒的现代性使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面对日益消失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产生了文化自觉,产生了文化自觉的少数民族开始利用大众传媒对濒临消失的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修补、重构。具体的做法就是对正在消失的传统文化进行报道,并利用各种方式再现传统文化,帮助人们寻找已经濒临消失的民族文化记忆,这对于增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认同是非常必要的。

▲ 此论文系作者承担的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大众传媒与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1XXW009”

注释

- ①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 ② 许广智.西藏传统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上[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6
- ③ 韩震.现代性与认同问题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4(6)
- ④ 李元元.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变迁过程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3)
- ⑤ 张瑞倩.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1)

(作者刘新利: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上接第31页)也更倾向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观点;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功力,用质朴的口语深入浅出直达人心。

(四) 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与央视评论节目的差异

有句俗话说做“内事看中央,外事看凤凰”。央视新闻注重导向性,关注评论问题的视角更注重新闻舆论的社会效应;凤凰资讯更多是传递给观众客观资讯,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更大一些,它选取题材时可能更倾向于经济效益。

(五) 凤凰卫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不足

1. 评论题材过分集中,观点选题重复。凤凰卫视评论节目过多也有着它的

弊端,一天当中,一星期当中,一个月当中,全球能称之为大新闻事件的毕竟有限,而每个独立的节目也不会说顾及到别的节目已经选了某个话题而转去挑选那些剩下没有多少评论价值的残渣。这必将导致多个节目选题重复,让观众在同时看了几个评论节目后,对一些节目产生厌烦的感觉。

观点即使可以不同,但是凤凰一向强调它的客观,所以每次也会提出多个观点进行分析。每个节目都拥有多个观点,多个观点重合难免有重复,所以无法保证观众不产生厌恶感。

2. 工作人员分工不明确,没有明确的专业分化。分工不明确也是观点选

题重复的原因之一。比方说,胡玲可以是《新闻今日谈》的主持人,又可以是记者。同样是《新闻今日谈》,阮次山今天是嘉宾,明天可能会是主持人。姜声扬是《时事开讲》的主持,又是《午间特快》的资讯播音员,而《时事辩论会》的嘉宾都有可能是该节目的幕后策划。一个嘉宾同时上了这个节目又上那个节目,在节目间选题相似的情况下难免不能保证节目观点的不重复。

(作者简介:赵晓婧,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院新闻教研室;孙玉凤,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院新闻教研室讲师)